

李大钊与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学系 图书馆

李大钊同志一九一八年二月起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部主任(即图书馆馆长),同年十二月,又当选为北京图书馆协会中文书记。在主持图书馆工作的六年多岁月中,李大钊同志披荆斩棘,除旧布新,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建树了不朽的业绩。

利用图书馆阵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同志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期间,正是“五四”运动酝酿、爆发和向深广发展的时期。为了启发群众觉醒并培养革命骨干,他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图书馆的首要任务。

据《北京大学日刊》报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部订购的国内外进步刊物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和《Soviet Russia》、《The new russia》、《The communist》等十余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在四十种以上,例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上为西文版;《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以上为日文版。还特别开辟了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阅览室。(见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三月十九日、三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日刊》)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前提。

李大钊同志除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外,经常把一些进步学生吸引到图书馆内,向他们推荐马克思主义书籍并随时进行讲解和辅导。当时有少数人指导思想不纯、学风不正,读了片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拿来装璜门面,卖弄渊博。李大钊同志为了阐发革命真理并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的基本思想简明扼要地编译出来,便于大家完整地、正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不致断章取义及受骗上当。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言教身教,一九一九年,经济系学生李泽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其后一些进步学生搜集了若干马克思主义书籍,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共产主义的音译)。现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还保存着一些盖有“亢慕义斋”图章的书籍。一九二〇年三月由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李大钊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政治硕果。该会附设的图书室,到一九二二年,收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已有六十多种(其中三分之二是英文版,三分之一是中文版),马、恩的主要代表作大体都有。

李大钊同志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但对“五四”运动起了启蒙作用和推动作用,而且培育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邓中夏同志便是突出的代表。邓中夏原先崇拜戊戌变法中英勇献身的谭嗣同,把谭的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革命的暴力,逐步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图书馆应当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同志为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指明了政治方向。

既反对封建的藏书楼方式,又反对超阶级、超政治的图书馆学观点

图书馆是通过自己拥有的书籍期刊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文化机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

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名目繁多的藏书楼，它将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结晶——书籍，藏之高阁深阁，定下了无数清规戒律，专供统治阶级鉴赏，对人民大众搞蒙昧主义。李大钊同志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的著名演说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要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代图书馆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它应“是研究室，管理员不能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见《平民教育》一九一九年第十号）这些话表明了李大钊同志的办馆方针。

从一个“守书人”到为教育、为科研服务的“先行官”，不只是形式的不同，而是有本质的区别。李大钊同志指出：“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同上）

社会的图书馆，即公共图书馆，李大钊同志认为：要使它成为向中国人民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的工具，应该面向劳工。他强调指出：“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报社，专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览。”（《劳动教育问题》见1919年2月14、15日《晨报》）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里，李大钊同志进一步指出：“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的生活相对照的新生活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要求“多办市立图书馆，通俗的尤其要紧。”他主张“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见1919年9月21日《新生活》第五期）

对于学校图书馆，李大钊同志觉得它是有别于社会图书馆的，“它和教授法有密切的关系。教授法若是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换句话说，它受学校教育方针和方法所制约。特别是高等学校图书馆，担负着提高的任务，侧重在为教育和科研服务。李大钊同志认真探讨和研究了办好图书馆和教育发展的关系。他说：“想教育发展……非依赖图书馆不可”；而学校图书馆所“含有教育的性质”发挥得好，就能大大促进教育的发展。他说“从前旧教授法是教师为主体的。”现在除了“在教科书和讲堂以外，还由教师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为学生自动的材料。”（以上引文均见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这样做，既可使学生加深和扩大课堂知识，又能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

李大钊同志在反对把图书馆办成封建藏书楼的同时，十分警惕那种超阶级、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思想侵蚀。一九二〇年夏，在北京高等师范第一次举办的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上，清华学校图书馆长戴志骞向各省学校图书馆馆员们强调：作为一个图书馆员的基本前提就是“不可投入政治或党派范围。”会上，李大钊同志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宣传自己的主张，抵制了戴的那套超阶级、超政治的货色。他说，他希望通过这次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使进步的图书能得到广泛的流通，以教育中国青年。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六年多的具体实践，为无产阶级创办自己的图书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延安时代的公共图书馆，蒋管区的地下通讯图书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类图书馆，继承并贯彻了李大钊同志提出的办馆方针。

积极依靠群众，尽量方便读者

贯彻群众路线是搞好图书馆工作的关键。李大钊同志在这方面同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北京大学教授刘复深情地赞叹说：“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自从做了图书馆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很刻苦的想法改良；而且曾经开过几次会议，请校内诸位注意收藏事业的教员，帮同他设法改良。”（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28日）

刘复自己就发表为长达五千余言的《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他指出：“无论那一种书，必须经过具有专门学说的人审查了才买来，才适合于实用，才不至于不经济。”（同上）在图书的收藏编目上，刘复提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并介绍了大英博物馆组织藏书的先进办法，还设计了两种图书标鉴的格式。顾颉刚教授深感中文书籍旧分类的不便，建议重新编目，并设想了拆散丛书、编辑《学派书目》和再编《分类书目》等三项步骤。（详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5日）吴康不赞成顾颉刚的办法，提了几条商榷意见。（详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6日）该校学生李良骥则对筹办北京大学图书馆草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8月12日）真是主任倡导，师生献策，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共同为办好北京大学图书馆而努力。

李大钊同志建议组织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委员会，既是咨询机构，又是决策机构，从图书馆的重大问题（如《图书部试行条例》和各研究所、阅览室书籍均归图书部登录编目等）到一般业务（如添购南方各报、纸片目录每类应编总号等）都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向校长报告后即向全校师生公布，（详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0日）以取得群众的监督和支持。

遇到困难，李大钊同志总是同群众商量。如阅览室缺《奋斗》第三期，各处补配不到，就在校刊上登了一则征刊启事，希望读者捐助。又如为帮助比利时鲁蓄大学解决缺乏汉文书籍的问题，靠馆内抽取无法满足，便发动广大读者帮忙筹集。（见1920年5月6日、5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李大钊同志除坚持民主办馆，还十分关心读者的需要，正确地满足读者对于图书的要求，不断提高服务工作质量。在借书方法上，他反对“文库式”，主张“开架式。”指出：“旧图书馆采用文库式，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阅书的人不能亲自拿来，只能在目录里查出书名填在单子上叫管理员拿来；若是拿的不合用，又要按以前手续去换。”徒劳往返，浪费时间。他认为欧美各国的“开架式”好处较多，不但“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其“弊处”是失书较多。（见《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演说辞》）事实上任何办法都不能十全十美，只要利多于弊就可以采用。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搞过一段“开架式”试验，他认为这是“图书馆的新趋势。”六十年后再来探讨这一问题，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李大钊同志认为：要方便读者，图书的分类与目录组织亦需作相应的改变。他说：“从前的目录是字典式的，就是以书名的A、B、C、D、排列。这种目录很适于文库式，因为可以使管理人员便利。但是开架式目录宜于分类，就是以书籍的性质去分别。因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若是用字典式，那就不太方便了。”（同上）为此，组织力量仿照《杜威分类法》将馆藏西文图书加以改编，做了一套卡片目录放在第四阅览室内供读者参阅，并在校刊上贴出布告：“望同校诸君，检查之际，遇有不合，随时指告，必当力求改善。”（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24日）实践结果证明：颇受读者的欢迎。

开放时间也从方便读者出发。我们知道：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暑假期间下午闭馆，做内部工作。李大钊同志考虑到教师备课和学生预习等的需要，离开学还有十几天就贴出布告，向读者宣布：“近日暑气渐退，本校为便利阅者起见，自八月二十三日起除上午七时至十时开馆外，下午二时至五时一并开馆。”（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2日）方便读者，还是方便自己，这不仅是个工作态度问题，而且是个办馆路线问题。在处理方便读者和加强管理这对矛盾时，方便读者是目的，加强管理是手段。李大钊同志倡导的一切为便利读者的服务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发扬。

对各类图书“兼容互需”对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

李大钊同志对于人类的新旧两种思潮，对于图书馆藏书所反映的各种学说和主义，他都能够辩证地进行考察，妥善地加以处理。他曾经说：“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两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他又说：“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见《新旧思潮之激战》原载《每周评论》第12号）正是这样的指导思想，李大钊同志一面把北大图书馆当作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对各类图书兼收并蓄，广泛收藏。除发挥原来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北京大学图书部前身）所藏几万册图书（主要是线装古籍）的作用外，又补充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具有现实社会政治意义的图书。据统计，在他任图书部主任期间，汉文书籍扩大到二十余万册，西文书二万册，日文书千余册。还把他在日本留学时带来的《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经济论丛》、《早稻田讲演集》和明治大正五年九月出版的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多种书籍全部都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图书尽量加以补缺，如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学第十次总务会议上，李大钊同志提议补刻《刘申叔先生遗著》四种。”（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7日）除上述而外，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予以收藏。这为的是通过假、恶、丑显示真、善、美。通过比较，读者自己会增强对真理“自信独守的坚操。”轻视反面教材的作用，就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针对当时有些人把马列主义视为异端邪说，妄图加以禁止，李大钊同志指出：“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它，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即使是异端邪说，也应该让“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这样“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把它隐蔽起来，很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见《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原载《每周评论》第24号）

同时李大钊同志还主张中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他决不因反对胡适“媚美崇美”就盲目排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了一则《图书馆通告》，内容为：“纽约近宁图书公司代表密勒器俄君持来教科书籍多种，于十九日下午及二十日，在本校图书馆第五阅览室陈列，以供众览。”这是李大钊同志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形象说明。在他的文章和演说中，除介绍欧美的“开架式”、“杜威分类法”和图书馆员的训练等外，还赞扬过美国大学图书馆在学校教学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在美国，“助教不必上堂授课，只在图书馆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这种制度有两层利益，一层可以清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批判地吸收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推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重视图书馆的技术问题，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训练

列宁夫人恩·克鲁斯卡娅强调指出：“书籍的完整，藏书的充分利用，对读者要求的满足，以及图书馆的政治面目，都取决于图书馆的技术问题。”（参见北大图书馆学系编译的《列宁论图书馆》第130页）图书馆的技术问题体现在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李大钊同志不但亲自过问，而且一抓到底。

为了使内部工作职责分明，有章可循，在李大钊同志主持下，制定了《图书部试行条例》（共十三条），规定全馆“暂设登录、购书、编目、典书四课”（相当于现在的组或科），每课均

有具体的职责范围和办事细则。

李大钊同志十分注意读者工作,对学术价值较高的图书(如陈衡哲教授指定的研究中欧交通史的十种图书)陈列在阅览室内供广大师生参考,其中有本《大秦景教流行碑》还是李大钊同志亲自到外单位借来的。有时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介绍单位或个人赠送书籍目录加以宣传推广。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藏书作用并使大家都有浏览的机会,规定“凡非有复本之书籍概不出借,一律陈列在阅览室内。”

为检查和总结某一时期为读者服务的情况,发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李大钊同志特别重视读者阅读情况的统计。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图书馆的二则消息:一是图书馆第一阅览室中文杂志阅览月报;二是图书馆每月杂志借出统计表;三是图书馆第三杂志阅览室十月份统计表。通过统计,一方面可以看出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程度;另一方面便于掌握各类杂志的流通情况;再方面能够了解各种类型读者的阅读倾向和阅读特点。将其公诸于众,还能起促进读者进一步利用图书馆的作用。

为加速图书流通,方便多数读者,李大钊同志以图书部主任或典书课的名义经常出布告催还图书,并把久借不还者的姓名在校刊上公布出来,发动群众检查督促。

加强管理人员的业务训练是提高图书馆技术问题的关键。李大钊同志除在实际工作中发动馆员互相探讨和实际传、帮、带外,热忱希望北京高等师范“添设图书馆专科简易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教育知识。”他把图书馆工作获得业务知识训练看作“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为此,他除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兼讲图书馆学课外,还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的北京《晨报》上发表署名《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学校从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九五年的发展情况和课程设置,还列举了夏季学校见习班,图书馆讲演会、谈话会及师范学校内的训练等方法,说明搞业务与不搞业务训练大不一样。

*

*

*

总而言之,李大钊同志从指导思想、办馆方针、办馆路线、藏书建设、业务技术等方面,为中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我们应该学习李大钊同志的革命精神,继承传统,努力创新,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图书事业,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

(上接第92页)

帝已躬自观史。“唐太宗进一步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回答说:“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在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似乎看透了唐太宗的心事,因而进言道:“人君有过矣,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褚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褚遂良坚持董狐的精神,毫不苟且;刘洎阐发董狐的精神,十分精辟。根据刘洎的

观点,喜欢当然好,害怕是无济于事,干顶更是达不到目的。我想,历史的判决之所以称之为公正之最,无情之最,道理就在于此。

(注1)《左传》(鲁宣公二年)杜预注:“赵穿,盾之从父昆弟之子。”

(注2)《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载“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之杀之,其弟嗣书而死二人。其弟又书,乃害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记书矣,乃还。”